

方立天文集

第七卷

第一卷 中国佛教

第二卷 魏晋南北朝佛教

第三卷 法藏与《金师子章》

第四卷 佛教哲学

第五卷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

第六卷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第七卷 中国佛教文化

第八卷 中国文化与中国宗教

第九卷 中国古代哲学（上下）

第十卷 杂著

中国佛教文化



方立天文集

第七卷

中国佛教文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佛教文化/方立天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5
(方立天文集; 7)
ISBN 978-7-300-15774-0

I. ①中… II. ①方… III. ①佛教-宗教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0776 号

方立天文集 第七卷

中国佛教文化

Zhongguo Fojiao Wenhua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24.75 插页 4	定 价	860.00 元 (全十卷十二册)
字 数	341 000	本卷定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1985年10月，中日首届佛教学术会议两国学者于日本京都合影。右二起：盐入良道、楼宇烈、杜继文、任继愈、道端良秀、中村元、方立天、本间昭之助、牧田谛亮、镰田茂雄、杨曾文、本间量惠。



● 1987年7月中旬，在美国圣迭戈参加国际中国哲学第四届年会。右起：汤一介、冯天瑜、方立天、刘大钧。



● 1992年3月，留学斯里兰卡五比丘拜师会后留影。前排右起：吴立民、季羨林、赵朴初、方立天。中排右起：建华、学愚、广兴、净因、圆慈。后排中李家振、右二张文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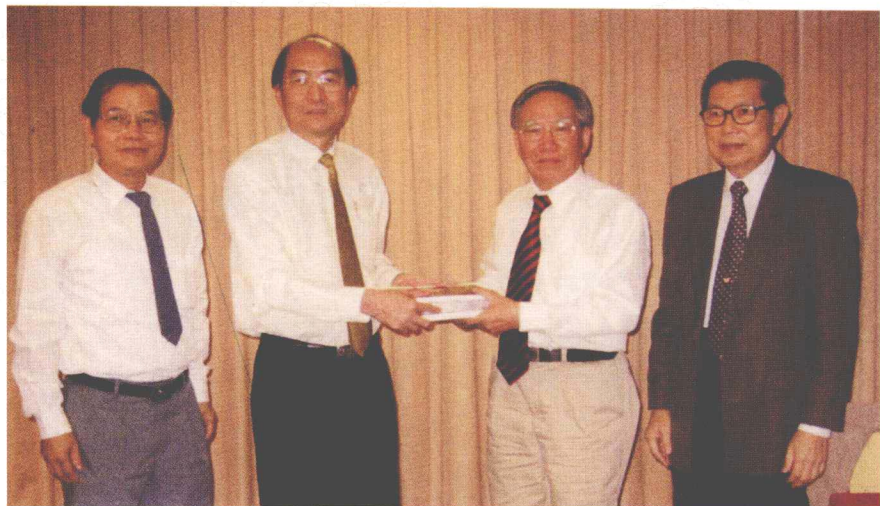
● 2009年9月27日，中日佛学会议与会者摄于人大科研楼前。左起：张风雷、宣方、邢东风、葛兆光、末木文美士、楼宇烈、方立天、姚卫群、斋藤智宽。



● 1997年10月，摄于日本京都。右起：任继愈、杨曾文、方立天、吴云贵、郑文林、戴康生、楼宇烈、曹中建、宋立道、方广锬。



● 1998年12月，摄于在广东罗浮山举行的“第二届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右一李锦全，右二卿希泰，左一张继禹道长。



● 2005年9月赴新加坡讲演。左起：新加坡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黄大志、喜耀文化学会副会长郭文龙、方立天、苏新逵。



● 1996年12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讲学时留影。前排右四许抗生、左三李中华。

这部集子的缘起是，今年（2011）9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茶歇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和我面谈，约我重新编一部个人文集出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我的五部专著和六卷本文集，现在又约我重编一部文集出版，对于人大出版社的这种盛情雅意，我极为感动，深为感激。

五年前出版的六卷本《方立天文集》，约结集了我的一半著述；现在这部文集，收集了迄今为止我撰写的绝大部分作品，并根据著作的性质，分别按中国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法藏与《金师子章》、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佛教文化、中国文化与中国宗教、中国古代哲学以及杂著等不同内容，统编为十卷十二册，约五百万言。十卷本比六卷本增加了约一倍的篇幅，新增内容是《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卷二册，中国佛教和中国佛教文化新增的文章较多，各成一卷，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宗教的著述则合成一卷，杂著一卷包括多年来撰写的序言、前言、创刊词、书评、追念前贤、治学等内容。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先后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1987）、《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哲学大辞书》（辅仁大学出版社，1993年后陆续出版）、《孔子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中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等，撰写过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的条目。《中国哲学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中的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部分为我所写，《中华的智慧——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精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一书，我撰写了葛洪、僧肇、法藏、慧能、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七篇。这些为集体著作撰写的稿子，均不收入本文中。此外，有一些与他人合作而非我执笔的文章也未予收入。

新编十卷本文集的内容，反映了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探索的方方面面，记录了我漫长学术生涯的前进足迹，也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折射出了社会和时代的变迁、进步。借此作序的机缘，回顾和总结个人学术生命的历史因素、生涯规划、耕耘布局、治学方法、主要收获、经验教训以及人生体悟等，是我十分有兴趣的。

1949年我初中毕业。不久，家乡（浙江永康）解放。1950年春，我到上海，在华东税务学校（后与华东粮食学校合并，更名为华东财政学校）学习，随后留校工作。约在1953年，我由从事行政工作转为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先后讲授或辅导过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教学过程中，我逐渐对哲学的思辨性、抽象性产生了兴趣，幻想日后能遨游在自由的思维天地之间。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年轻在职干部报考高校，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从此我的生命开始真正和哲学结缘。学习期间，我又对中国哲学最为喜好，内心默默地许下的心愿，期盼毕业后能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61年北京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这为我实现从事中国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夙愿提供了最佳的舞台。此后，我又想中国哲学历史很长，必须确立一个时段作为研究重点。经过反复思考，我确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哲学

为学术研究的重心。这一时期的哲学广泛涉及儒家、道家、道教和佛教等多个领域，我又选定其中的佛教哲学作为研究重点。我之所以这样选择，一是深感佛教哲学内涵丰富，与中国文化、哲学的关系密切；二是受家乡、家庭传统佛教信仰的影响，对佛教有一种自然的亲和感；三是在治学取向上，个人比较偏爱冷门，好攻难点，不畏艰苦。也就是说，理智的判断、情结的作用和性格的特征，决定了我开始研究当时被喻为“险学”的佛学，且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永不再走回头路了。

经过上世纪60年代初数年间的探索、运思、实践，我确定了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交叉结合、互动互补的佛教学术研究方案，并粗略地制定了近期、中期研究规划和长期目标。个案研究主要是佛教代表人物的研究。我认为，一部佛教史就是佛教代表人物和广大信徒的信仰修持史，一部佛教思想史主要是佛教代表人物的思想成果史。研究历史上的佛教代表人物，就能展示佛教尤其是佛教思想演变、发展的途径和内容。根据这一思路，我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代表人物如道安、支道林、慧远、僧肇、道生、梁武帝萧衍等着手开展佛教的研究。在日后的研究中，也始终倾心于对不同佛教代表人物如华严宗创始人法藏、禅宗创始人慧能等的关注和研究。

佛教文献是佛教思想研究的基础，把握佛教文献的文字、结构、内涵、实质，对于佛教思想的研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整个佛教研究工作过程中，我比较重视资料的积累，参加了《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3—1992）的整理工作，并对部分佛教文献做了标点、校勘、注释、今译，有的已整理成书出版。

在若干个微观研究和一定资料积累的基础上，上世纪80年代，我又开展了对佛教的宏观研究。重点工作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佛教哲学的整体研究，也可以说是佛教哲学的现代化研究。我撰写了《佛教哲学》一书，在书中我着重论述了佛教的人生价值论、宇宙论（要素论、结构论、生成论和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丰富内涵，力求用现代语言表述佛教哲学理念，运用现代的多元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并力图立足当代社会背景，发掘和评判佛教的价值与弊端，贡献与缺陷。二

是佛教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可以说是佛教文化的中国化研究。在《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专书和《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等有关论文中，我把佛教中国化界定为“三化”，即民族化、本土化和时代化，并叙述了佛教中国化的不同阶段、途径和方式，还通过与中国的政治理念、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民间信仰、社会习俗等的互动关系，揭示出佛教中国化的实质，总结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的六个重要特点：重自性、重现实、重禅修、重顿悟、重简易、重圆融。

我研究佛教秉持的是“中国本位”立场，我认为中国人是以先前本国文化结构去理解佛教的，是以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和精神需求去对待佛教的，是以中国儒、道本土文化去改造佛教的。也就是说，我是在中国文化、思想、哲学的演变、发展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国佛教文化、思想、哲学的流传、兴衰。因此，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也分外重视对中国哲学的研探，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撰写了《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我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目的，其一是为了阐扬中华智慧，其二就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佛教哲学。

在以上微观和宏观的学术研究取得相应成果的基础上，我开始全力专攻自己学术生命中的“重点工程”，开展对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整体研究。我从中国僧人的佛教著作出发，在与中国儒道思想、印度佛教思想的互动、比照中，千淘万漉，吹沙觅金，历时十五年，先后撰写百余篇文章，尔后形成了九十余万言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一书。全书设为绪论、总论、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实践论（修持论）和结语七个部分，除绪论和结语外的五编三十二章为全书的主体，心性论与直觉论为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两大要点，由此而初步构筑了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在该书的“绪论”中，我分述了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具体方法：结合现代哲学发展的要求，筛选、归结中国佛教的重大哲学问题，构筑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体系；运用现代语言，诠释中国佛教哲学的概念、范畴；寻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原来意义；体会中国佛教某些哲学语言的言外之

意；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总结中国佛教哲学理论思维成果；进行比较研究，以把握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特色；阐发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与意义。这八条是我的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研究方法的初步归纳和总结。

从上述可见，我对佛教的研究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中国佛教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佛教哲学的现代化研究、佛教文化的中国化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的构筑。这五个方面的研究，大体上体现了我的佛教研究轨迹，构成了我迄今为止学术生涯的基本内容。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我的学术视野有所扩大，研究领域也有所延伸。在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双耕”的基础上，我对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国宗教理论产生了兴趣，并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做了一些探求性和探讨性的研究。

探求中华文化精神，是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此我撰文探求中华文化的传统和核心问题，提出了中华文化三大传统（儒家的人本主义、道家的自然主义、佛家的解脱主义）的看法，并认为人生价值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即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态度、思想、观点是中国国学之魂，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还强调思维方式对一个民族思考问题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宗教理论领域，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正确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着特殊的重要的现实意义。我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归结为宗教本质观、宗教价值观、宗教历史观和宗教适应观。我认为，对宗教的本质和功能缺乏科学认识，会导致宗教学和宗教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长期以来在宗教领域里流行的是“鸦片论”和“斗争论”，而毛泽东主席生前多次指出宗教是文化，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又积极倡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命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主要脉络，就是从“鸦片论”、“斗争论”发展为“文化论”、“适应论”、“引导论”，这是中

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领域的最伟大的理论创新，最重大的理论贡献；这对于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

清代散文家姚鼐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义理”，指的是研求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回眸以往岁月，我在中国国学这块丰腴的田野里默默耕耘，主要是走探索义理之路，也就是着力探索中国哲学思想，尤其是中国佛教哲学思想。这是一个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求真过程，也是一个体悟智慧、增长智慧的求智过程。每当回忆起驰骋独立思考、直抒胸臆的心路历程；每当回想起爬梳剔抉、笔耕凝道、学思有得、开心明目的收获时刻；每当联想起漫漫人生征途，深涧、峻岭，大川、坦途，独木小桥，阳光大道……此时此刻，不免心潮澎湃，难以自己！

光阴荏苒，人生无常。虽然如今我已近耄耋之年，但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今后我仍将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争取有所撰述，从而为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做出自己绵薄的贡献。

在即将结束序文时，我要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的盛情约稿，我还应该深深地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杨宗元、李红、符爱霞、吴冰华、吕鹏军、许微微、胡明峰诸同志，感谢他（她）们认真、细致、严肃的编辑工作态度。没有他（她）们的辛勤劳动，这部文集在半年时间里出版问世，是不可想象、绝无可能的。

方立天

2011年12月8日初稿，19日定稿

目 录

佛性述评	001
华严宗佛教哲学理论架构和范畴体系	013
佛教、佛法、佛学与佛教哲学	033
略谈华严学与五台山	042
禅悟思维简论	050
中国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简论	073
中印佛教思维方式之比较	085
般若思维简论	102
中国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类型和特点	117
论佛教文化体系	129
中国佛教文化漫说	144
《法华经》导读	150
中国佛教人生理想论	158
不立文字，见性成佛（访谈录）	210
《法华经》与一念三千说	215
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	
——中国佛教净土思潮的演变与归趣	222
人生真相与生命意义的寻求	235

中国佛学的心论	239
佛教哲学与世界伦理构想	249
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254
中国佛教伦理的社会意义	261
中国佛教的平等理念和当代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270
中国佛教慈悲理念的特质及其现代意义	279
佛教文化的内涵与建设	289
佛教伦理与“八荣八耻”	293
“缘”的理念与和谐社会	300
关于人间佛教的文化思考	302
佛教生态哲学与现代生态意识	311
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意义（访谈录）	325
佛教四缘说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330
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意义（演讲录）	336
佛教文化发展样式：传承与创新	353
在《虚云和尚全集》首发式暨虚云和尚圆寂五十周年 纪念活动上的讲话	362
中国佛学思想精华与当代世界文明建设（论纲） ——在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高峰论坛上的讲演	364
缘起与和谐	371
附：印度佛教人生理想论略说	374

佛性述评

“佛性”的起源及其在印度的演变

佛性观念是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基本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提出是佛教出世主义理论的逻辑必然。

佛教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人生以及世俗世界的一切，本性是“苦”，人生自身就是诸苦的集合体，为此就要探寻形成痛苦的原因和消灭痛苦的途径，以争取达到绝对安宁的无痛苦的所谓解脱境界。佛教不是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从社会阶级关系去寻找人生痛苦的原因，而是着重于把人看为自然体，并侧重从个人，尤其是从内心去寻求。认为个人的各种扰乱身心的迷惑苦恼，即烦恼的心理和相随而来的行为是招致人生痛苦的原因。消灭了这种原因，就从根本上消除了痛苦，获得解脱。由此进一步推论人心的烦恼既是造成痛苦的原因，同时人心又能摆脱烦恼的束缚，可见人心的自性（本性）不是和烦恼同类的，而是清净的，从而形成了“心性本净”的说法。这种本来明净的心性，起初被认为是佛祖释迦牟尼所具有的本性，并且得到发扬，是为佛性。释迦牟尼佛也称为“如来”，由此佛性也叫“如来性”。佛是所谓对宇宙和人生具有真实觉悟的觉者，由此佛性还叫“觉性”。

小乘佛教不认为众生可以成佛，也没有直接就众生的佛性问题展开论述。大乘佛教主张普度众生，众生都能够成就佛果，也就是将众生解脱的标准提高到和理想中的佛同等的程度。这样，心性本净，即“性净之心”被认为是众生普遍具有的，是成佛的因素、成佛的可能，所谓自性清净的人心被视为凡人藉以成佛的质地，而名为“佛姓”。“姓”有“种姓”、“种族”、“族类”的意义，“佛姓”就是佛这一族类。“佛姓”通常作“佛性”，佛性的“性”不是性质的意思，而是“界”的意思，也叫“佛界”，“界”有“因”，即质因、因素的意义。“心性本净”思想是佛性的起源，佛性由佛陀的本性发展为众生成佛的根据，从而在佛教教义中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大乘佛教中观理论创始人龙树着重阐述宇宙和人生的无自性思想，即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的理论，并以万物无定性的一般原理否定固定的佛性，而承认可能的佛性。他在《中论》的《观四谛品》中说：“虽复勤精进，修行菩提道；若先非佛性，不应得成佛。”^①又说：“以先无性故，如铁无金性，虽复种种锻炼，终不成金。”^②肯定其先不是佛性的，不能成佛，如同铁不能成金一样。这个说法也等于说，若先有佛性，经过修习就能成佛；承认众生可以成佛，就等于承认众生也是有佛性的。

大乘佛教《般若经》和《法华经》都没有讲佛性，其后出现的《涅槃经》在思想上发生重要变化，此经发展中观思想，着重阐述佛性问题。《涅槃经》主要内容是讲佛的最高的永恒境界，佛的境界是永恒的，也就是说佛身也是恒常的。经文认为佛身之所以是恒常的，是由于有恒常的佛性。佛性为烦恼累患所蔽障，而处于隐伏不显的状态，如果经过学习修持，去掉烦恼累患，佛性就会逐步显现出来，既可“闻见”（理解），又可“眼见”（肉眼见），直至完全显现，就成为佛身（“法身”），而且是永恒不变的。这是把以法为身的“法身”思想联系到“心识”方面，以“心识”而不是以“法”为法身的本质。这种佛性既非佛所独有，也非一切生类（众生）所共有，众生中的